

# 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

徐安琪

**内容提要**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和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从经济因素制约机制看,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却更大些。

**关键词** 家庭幸福感 经济因素 影响机制 非经济因素

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020

幸福感是以个人心理体验为特征的一种主观福利指标。人们一般按常理推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实际上不同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是宏观的跨地区和跨年代的比较研究。

Easterlin 在 1974 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通过对 20 多个国家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通常在同一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sup>[1]</sup>,并由此提出著名的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观点,即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之后不少研究都指出,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可能有大幅度增长,但主观幸福感可能不会相应提高<sup>[2]</sup>;比如,美国 1991

年人均实际收入是 1946 年的 2.5 倍,而主观幸福程度基本上保持不变<sup>[3]</sup>;对美国 and 英国的另一研究结果也得出类似的结论<sup>[4]</sup>;日本 1987 年的人均 GDP 比 1958 年高 5 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加<sup>[5]</sup>;对中国山东省 2002-2008 年的历时数据资料也显示,尽管在 7 年中,该省的人均 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抽样调查的人均收入持续递增,但城市的居民幸福指数却保持稳定<sup>[6]</sup>。

微观研究的结果则大多报告,高收入者的幸福感高于低收入者<sup>[7]</sup>,不少研究显示,在较为贫穷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较强<sup>[8]</sup>,或当人们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候,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sup>[9]</sup>。其原因在于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利和地位,伴有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庭价值观变迁研究”(07BSH029)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学特色学科重点项目资助。

心,安全感加强因而幸福感较高<sup>[10]</sup>。国内一项对山东省、威海市城市居民的研究结果报告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sup>[11]</sup>;另一项对 868 位北京居民的分析结果显示,物质条件状况满意度的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最大<sup>[12]</sup>。但不少研究均显示,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较微弱<sup>[13]</sup>。

作为家庭研究学者,笔者更关注人们的家庭是否美满幸福,因为家庭幸福是总体幸福感的最主要内涵,上世纪 70 年代 Campbell 等曾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 15 个因素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sup>[14]</sup>。国内不少研究也指出,婚姻幸福、家庭和谐是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sup>[15]</sup>。一些家庭幸福观的研究也显示,家庭关系和谐为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较靠后。但经济因素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对家庭幸福感起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 一、理论视角

关于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解释主要有如下理论视角:

(一)收入决定论 Venhoveen(1988)假设,基本需要的满足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即具有更高收入者更容易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故也容易达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低收入水平是和低幸福感相联系。众多研究报告,高收入者的幸福感高于低收入者(Campbell, 1976; Diener, 2002; Lever, 2004; Frijters, Haisken-DeNew, and Shields, 2004),国内也有研究显示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邢占军 2004; 黄志良 2003)。但也有研究显示,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较微弱(Fuentes and Rojas, 2001; 罗楚亮, 2009),其中一些仅以双变量的相关性作检验而未控制其他因素<sup>[16]</sup>,故个人的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缺乏有力证据。

(二)社会参照论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自己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生活得更好,当别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比自己更快时,即使个人的绝对收入有增加,主观幸福感在这时也是下降的。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的期望和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标准。比如个体现在和以前的经济状况,还有个体拥有的财富与其他参照个体拥有的财富比较,这都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而与他/她的收入水平无关(Easterlin, 1974)。一些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取决于

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sup>[17]</sup>。有研究检验了当前经济状况与过去的比较、对未来经济状况改善的预期以及对所处社会中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三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们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sup>[18]</sup>。

(三)适应理论 尽管在收入发生变化时,可能引起幸福感暂时的升高或降低,尤其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会降低,但从整个时间维度来看,可逐渐适应新的收入等级,从而削弱收入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sup>[19]</sup>。自我的心理适应机制会降低外界影响的作用,研究发现良性事件(如彩票中奖)或恶性事件(如截肢)对个体的幸福感有短期的强烈影响,但约 3 个月后就迅速恢复到一般水平<sup>[20]</sup>。Brickman(1978)等还关注于个体适应积极和消极事件的情感能力,并因此认为,即使在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具有更好适应能力的个体通常更幸福<sup>[21]</sup>。

(四)欲望理论 效用与欲望都是不同个体的主观感觉,所以幸福也因人而异。当效用给定时,欲望越大,幸福值越小。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森提出“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而欲望则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在实际生活中,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欲望也会或迟或早地相应增长,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长可以抵消作为分子的效用的增长,结果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能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相对而言通常有较强的幸福感,也就是“知足常乐”<sup>[22]</sup>。一项对 868 位北京居民的分析结果显示,物质条件状况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最大<sup>[23]</sup>。

(五)家庭压力论 家庭经济压力对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有重要影响,经济压力会导致夫妻间的冲突和互动上的障碍,并降低婚姻和家庭关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为不少既有文献所展示<sup>[24]</sup>。该理论强调家庭危机常建立在压力源/事件本身、对压力的主观认知、缓解压力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调适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上。家庭成员若对压力的主观认知不正确,加上应对压力的支持系统不足时,便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sup>[25]</sup>。

除经济因素外,婚姻状况<sup>[26]</sup>;自评的健康状况<sup>[27]</sup>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为不少研究所验证,比起收入和金钱来,这些因素在快乐的影响程度上或许重要得多,至少与幸福感互为因果。此外,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sup>[28]</sup>。

## 二、研究目标和资料

鉴于经济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复杂性,加上以往的建模研究大多只纳入收入和人口特征变量,或加上身体健康状况,却忽略了那些或许对幸福感有更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精神/感情生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沟通和包容等人际因素,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综合解释模型,在排除了上述精神/感情、人际互动等更为重要的因素,以及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身心健康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被访自述的家庭幸福感的主观评价:“总体而言,我们家很美满、幸福”(1-5 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

影响变量 a.借鉴上述概括的对幸福感影响的多元理论,将经济因素设计为 4 个指标:1.绝对收入(即年收入的平方)2.相对收入的比较判断:“和我国社会上的一般家庭比较而言,您家的收入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1-5 分别表示从“低得多”到“高得多”)3.欲望理论:以“总体而言,您对目前物质生活是否满意”(1-5 分别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测量,由于是对物质生活的主观评价,越是不满意的除了确实生活质量低外,同时也反映了其物质欲望更高4.家庭经济压力“在过去 1 年中,您家有没有面临下面所列的经济困难、限制或压力”,并将其中“平时或到月底时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家庭日常开销”、“因日常开销/交学费/医疗费而向亲戚/朋友借过钱”、“有病不看医生/推迟看病/吃药/手术/吃低效药”(0-2 分别表示从没有到严重)等 3 项相加计总值(3 变量的信度 Alpha=0.79)。

本研究同时还纳入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对家庭成员互相信任、遇问题或冲突时的沟通/协商、对不同意见和分歧的妥协/包容等家庭人际关系评价的满意度指标(1-5 分别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健康变量除了身体健康外,还将积极乐观的心态作为心理健康指标,即“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都相信总会好起来的”(1-5 分别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

用以检验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资料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庭价值观变迁研究”在上海和兰州城乡以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完成的对 20-64 岁男女的 2200 份问卷调查数据。样本特征为:男性占 50.5%,女性占 49.5%;市区占 66%,郊县 34%;上世纪 40 年代出生占 13%,50 年代 24%,60 年代 28%,70 年代 24%,80 年代出生者占 12%;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占 16%,初中为 32%,高中有 29%,大专及以上占 23%;已婚者占 86%,未婚者占 7%,再婚者有 3%,离婚/丧偶为 3%,同居者占 1%。有关变量的刻度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年收入(IN)	2200	0	13	9.19	
年收入平方	2200	0	164	88.51	1.998
认同自己家庭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	2198	1	4	2.48	25.693731
物质生活满意度	2200	1	5	3.44	
家庭经济压力(复合)	2200	0	10	1.42	.974
与同龄人相比的身体健康状况	2200	1	5	3.51	2.105967
对挫折的积极乐观心态	2200	1	5	4.21	
家庭成员之间能互相信任	2200	1	5	4.27	.594
遇问题或冲突时沟通、协商	2200	1	5	3.86	.667869
对不同意见和分歧相互谦让、妥协	2200	1	5	3.90	.763
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	2200	1	5	3.86	
性别(1=女)	2200	0	1	.49	.808
年龄	2200	20	64	42.46	.500
年龄平方	2200	400	4096	1933.02	11.401
受教育年数	2200	0	23	10.17	971.929
城乡(1=市区)	2200	0	1	.65	4.103
地区(1=上海)	2200	0	1	.55	.476
婚姻状况:初婚	2200	0	1	.84	.498
未婚	2200	0	1	.09	.368
离婚	2200	0	1	.02	.281
丧偶	2200	0	1	.02	.127
再婚	2200	0	1	.03	.135
总体而言,我们家很美满、幸福	2200	1	5	4.26	.167700

## 三、研究结果和解释

描述性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访认同自己的家庭美满、幸福,其中自述较美满、幸福的为最多,达 56.6%,认为不美满、不幸福的只占 3.7%;对精神/感情生活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达 77.2%,不满意的仅为 8.2%。但对物质生活表示满意的比例低得多,只占 57.8%,不满意的有 18.9%;41.3%的被访在过去

1 年中或多或少面临经济拮据、借过钱或有病不看医生等经济压力。不过,绝大多数被访对家庭前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94.2%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家人都相信总会好起来的”的判断。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对家庭幸福感具有决定作

用,经济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呢?表 2 的回归分析结果未支持绝对收入决定理论,家庭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也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更大些。

关于家庭幸福观的前期研究未支持人们的幸福

表 2 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B(Beta)

	全体	女性	男性
(Constant)	.703**	.978**	.439
一、经济因素			
年收入(IN)	.024(.068)	.024(.074)	.002(.006)
年收入平方	-.002(-.085)	-.002(-.082)	-.001(-.047)
认同自己家庭的相对经济地位较高	.035(.034)+	.029(.029)	.048(.052)
物质生活满意度	.046(.063)**	.046(.063)*	.047(.066)*
家庭经济压力(复合)	-.029(-.062)**	-.022(-.045)	-.036(-.076)*
二、身心健康			
与同龄人相比的身体健康状况	.029(.038)*	.033(.044)+	.017(.025)
对挫折的积极乐观心态	.283(.176)***	.283(.228)***	.146(.130)***
三、家庭人际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能互相信任	.169(.161)***	.144(.146)***	.196(.172)***
遇问题或冲突时沟通、协商	.078(.097)***	.082(.105)***	.072(.087)**
对不同意见和分歧相互谦让、妥协	.119(.130)***	.111(.122)***	.134(.145)***
四、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	.183(.212)***	.172(.200)***	.194(.224)***
五、人口控制变量			
性别(1=女)	.012(.009)		
年龄	.009(.146)	-.012(-.196)	.030(.503)*
年龄平方	.000(-.220)	.000(.096)	.000(-.549)*
受教育年数	.001(.004)	.003(.019)	-.002(-.013)
城乡(1=市区)	.077(.052)*	.051(.034)	.098(.068)*
地区(1=上海)	.077(.055)**	.104(.072)*	.065(.047)
婚姻状况(以初婚者为参照)			
未婚	-.036(-.014)	-.090(-.032)	.013(.006)
离婚	-.223(-.040)*	-.204(-.039)	-.281(-.047)+
丧偶	-.279(-.054)**	-.227(-.055)*	-.507(-.062)*
再婚	-.110(-.026)	-.265(-.059)*	.006(.002)
R <sup>2</sup>	.335	.379	.306
调整后的 R <sup>2</sup>	.329	.367	.293
F	52.29***	32.40***	24.05***

+p≤.10,\*p≤.05,\*\*p≤.01,\*\*\*p≤.001,下同。

观为物欲主义所主宰的社会刻板印象,本研究同样显示,非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正面效应更大些,如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信任、沟通和包容会显著增进被访的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与幸福感也相互促进,但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更显著些。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后,未显示女性的家庭幸福感和男性有显著差异;上海被访比兰州、市区被访比郊县有更大概率认同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

人口特征变量虽有一些影响,但强度和显著性不大,离婚、丧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也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类同。就性别差异看,与初婚和未婚相比,再婚女性有更大的概率认为自己的家庭不幸福、不美

满;家庭经济压力只对男性具有解释力;就男性而言,市区男性更具幸福感,另上海女性的幸福感多于兰州。从城乡差异看,经济因素对市区被访的家庭幸福感基本不起作用,而家庭成员间的积极互动则主要对市区具有重要影响,对郊县被访的家庭幸福感则基本无影响,但物质生活满意度高的郊县被访也有更大的概率述说自己的家庭很幸福、美满。此外,上海郊县比兰州郊县被访的家庭幸福感更强(见表 3)。

#### 四、研究启示和局限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

表3 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B(Beta)

	郊县	市区
(Constant)	1.132*	.613*
一、经济因素		
年收入(IN)	-.034(-.065)	.024(.081)
年收入平方	.001(.034)	-.002(-.081)
认同自己家庭的相对经济地位较高	.065(.059)	.041(.046)+
物质生活满意度	.114(.150)***	.019(.028)
家庭经济压力(复合)	-.028(-.064)	-.013(-.024)
二、身心健康		
与同龄人相比的身体健康状况对挫折的积极乐观心态	.028(.040)	.008(.011)
三、家庭人际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能互相信任	.071(.064)+	.224(.221)***
遇问题或冲突时沟通、协商	.058(.068)+	.088(.113)***
对不同意见和分歧相互谦让、妥协	.080(.083)*	.139(.156)***
四、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	.154(.159)***	.191(.233)***
五、人口控制变量		
被访性别(1=女)	.026(.017)	.010(.007)
年龄	-.006(-.091)	.015(.260)
年龄平方	.000(.015)	.000(-.329)+
受教育年数	.011(.055)	-.004(-.023)
地区(1=上海)	.167(.110)*	.031(.023)
婚姻状况(以初婚者为参照)		
未婚	-.074(-.024)	.003(.001)
离婚	-.816(-.068)*	-.187(-.042)*
丧偶	-.320(-.057)+	-.262(-.054)*
再婚	-.202(-.043)	-.067(-.017)
R <sup>2</sup>	.307	.390
调整后的 R <sup>2</sup>	.288	.381
F	16.38***	45.23***

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而对物质生活没有很高的期待、过高欲望的个体,以及尽管缺乏经济资源,但却相信总会好起来的被访也有更多的家庭幸福感,也就是说只有减少攀比心理、遇到任何挫折、失意都要知足常乐,才能经常感觉快乐、幸福。

然而,尽管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未必会带来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被访,那些面临经济拮据、生活困难被访的幸福指数更低也为我们的研究所证实。发达地区被访的家庭更幸福且更多地受非经济的家庭人际互动因素的影响,而相对贫困的地区和群体的幸福感更多地受物质生活水平和期望值所制约。也就是说,只有在生活无忧的情况下,人们幸福感才更少地被经济因素所左右。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和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就业、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关爱家庭”、“以人为本”出发,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尤其要关心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让全体公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以更有效、实在地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绝对收入理论未在我们的微观样本中得到支持,这或许与年收入变量仅为被访而不是家庭总收入有关。但家庭总收入资料的收集难度较大也限制了相关验证(如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使许多被访不清楚子代尤其是媳妇、女婿的收入,更不清楚孙子、外甥等的收入)。因此,本研究只是初步验证了相对收入/比较理论、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解释力,但不能证明绝对收入理论的影响力。

#### 注释

[1][6] 参见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Oswald, A.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107, 1815-1831.

[3]Easterlin, R. A.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11, 465-484.

[4]Blanchflower, D. G. and Oswald, A. J.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7-8), 1359-1386.

[5]Veenhoven, R.(1995).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4, 299-313,

[7]Campbell, A. (1976). 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31, 117-124.

Veenhoven, R. (1988). The utility of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3), 334-354.

Diener, E.D. & Diener, R. B. (2002).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2), 119-141.

Lever, J.P. (2004). Pover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exico.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4, 68(1), 1-20.

Frijters, P., Haisken-DeNew, J. P. and Shields, M.A. (2004). Money Does Matter! Evidence from Increasing Re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ast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730-741.

[8]Veenhoven, R. (1991).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 1-34.

[9]Oswald, A.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107, 1815-1831.

[10][19]李儒林、张进辅、梁新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理论》〔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年第11期。

[11] 邢占军:《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海南〕《新东方》2004年第11期,黄志良:《威海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2][23] 王华强:《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武

汉]《统计与决策》2010 年第 3 期。

[13]Fuentes, N. and Rojas, M. (2001). Economic theor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xico.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3 (3): 289-298. 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京]《财经研究》2009 年第 11 期。

[14]转引自邢占军:《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上海]《心理科学》2003 年第 6 期。

[15]李志强:《对成都地区青年农民工幸福观调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 年第 9 期;李志、张旭东:《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幸福观的调查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李承宗、韩仁生:《幸福感与不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究》[开封]《心理研究》2011 年第 2 期。

[16]刘晓霞、邢占军:《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17]Clark, A. E. and Oswald, A. J.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 359-381.

[18]Graham, C. and Pettinato, S. (2001).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3), 237-268.

[20]Diner, E., Suh, E. and Oishi, S. (1997). Recent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4 (1), 25-41. Silver, R.L. (1982). Coping with an undesirable life event: A study of early reactions to physical disability.

[21]Brickman, P., Coates, D. and Janoff-Bulman, R. (1978).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8), 917-927.

[22]参见左学金:《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Easterlin, R. A.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 (19), 11176-11183.

[24]Conger, R. D., G. H. Elder, Jr., F. O. Lorenz, K. J. Conger, R. L. Simons, L. B. Whitebeck, S. Huck & J. N. Melby (1990). Linking Economic Hardship to Marital Quality and Instabi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2: 643-656. Kwon, Hee-kyung,

Rueter, M. A., Lee, Mi-Sook, Koh, S. and Ok, Sun Wha. (2003). Marital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the Korean Economic Crisis: Applying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5: 316-325. Vinokur, A. D., Price, R. H., and Caplan, R. D. (1996). Hard times and hurtful partners: How financial strain affects depress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f unemployed persons and their spou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166-179. Voydanoff, P. (1990). Economic distress and family relations: A review of the eigh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099-1115.

[25]McKenry, P. C. & Price, S. J. 编著:《家庭压力》,郑维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第 261-286 页;波玲·布思:《家庭压力管理》,周月清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版。

[26]Glenn, N. D. (1975). The contribution of marriage to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males and fema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 37, 594-600. White J, M. (1992). Marital status and well-being in Canad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 13, 390-409. Diener, E. d., Sapyta, J. J. and Suh, E. (1998).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essential to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Inquiry*, 9(1), 33-37. 叶南客等:《幸福感、幸福取向 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27]温晓亮、米健、朱立志:《1990-2007 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北京]《财贸研究》2011 年第 3 期;金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比较分析》[北京]《人口与经济》2011 年第 2 期;金江、张奎:《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28]陈世平、乐国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上海]《心理科学》2001 年第 6 期;李莹:《城市青年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调查分析》[北京]《社会工作》(学术版) 2011 年第 7 期。

[责任编辑:方心清]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Economic Factors on Family Happiness

Xu Anqi

**Abstract:** Th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theory, b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ive model, explore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economic factors on family happ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income is not a main factor of happiness, but satisfaction with emotional life,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mind, harmony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are of more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happiness.

**Keywords:** family happiness; economic factor; effect mechanism; non-economic factor